

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周棉

(徐州师范大学 留学生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要: 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始于鸦片战争,留学生群体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留美幼童、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和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通过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对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关键词: 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外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02)04-0118-06

文化的传播以及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与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和提高的客观规律。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流也是这样,对促进中西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促进作用。中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两个方面,它虽然可以理解,而且事实上这两者有时也是同时进行的,但一般说来,中学西传主要是指中国古代以四大文明为主要代表的物态文化之西传欧洲,它对欧洲近代文化的产生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西学东渐则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之传入中国。本文特从留学生的角度,论述留美幼童、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和晚清留日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

一、留学生群体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性质

(一)关于西学东渐

在鸦片战争之前,异质文化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始于汉代,直至隋唐,才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融合。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其标志是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到中国传教。西方传教士不仅通过传教传播了基督文明,而且也传播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特别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这时期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未能得到推广和普及。特别是自清雍正年间起至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实行愚昧的闭关自守的政策,中断中西文化交流一百多年,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而正是在此期间,欧洲各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与此相伴随,建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欧美诸国先后成为世界强国,并疯狂地向东方扩张。相反,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仍然以不变应万变,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依旧陈袭几千年来来的封建专制文化,盲目排斥异质先进文化。但是,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洋枪洋炮的炮火声中,以强劲的势头向古老的东方传播。所以,从源头和本质上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并不是自然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

收稿日期: 2002-07-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留学生与 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

作者简介: 周棉(1956-),男,江苏沐阳人,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伴随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扩张行为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文化输出。举凡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各种学术思想和基督教新教等,都被通过不同的途径、方式传入中国,其内容、规模、速度及影响,都是空前的。

但是,因为其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较中国封建的文化要先进、优越得多,所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又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好事。这是论述近代西学东渐必须肯定的一个大前提。面对不可阻挡的西学东渐大潮,中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顽固派更是视为洪水猛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转而向西方文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是在上述情况下,留学生群体应运而生。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势差”,在实质上,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就西方而言,是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开始的文化输出;就中国人而言,实际又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借鉴、选择和接受的过程。因此,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在很多地方更多的是指对西学的引进和运用,尽管我们在情感上并不愿意这样认为。

(二)关于留学生群体

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形成于留美幼童回国之后。而说到留美幼童乃至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留学运动,又不能不归功于容闳。容闳是现代意义上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但是他并不是国家派出去学习的,而是香港马礼逊学堂的美籍校长塞缪尔·布朗带到美国的。容闳1846年冬启程赴美,1847年4月抵达美国,初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但是,对传播者来说,历史竟是这样的无情:深受传教士栽培和西方文化熏陶的容闳,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确信:“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毕业前夕,已确立了这样的宏图大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P108)}1855年,他回到了苦难的故国之后,积极奔走,促成了中国官派留学这一破天荒的举措。由容闳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作为留学生的容闳,首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如果没有传教士来华传教办学,也就没有他留学这回事;其次,他虽然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但以中国为本体,可见中国文化对他影响之深和民族意识之强。但同时又可看出,中西文化已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其三,他以切身的经历和融合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见识,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可深思的问题:通过传播西学于中国,促使中国文明富强。

在那个时候,容闳本人虽然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但是,他为之擘划的方向却被历史所证实。他不仅通过提建议的方式,对当时一些握有重权的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在思想上加以影响,而且亲自组织开创留学的实践。于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在1872年离开中国,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其间更有自费留学等多种形式,形成了一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从而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以往士大夫阶层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这个新型的留学生群体,通过译介、教育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以图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

因此,留学生和留学运动从其源头来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其本质而论,又是向西方学习的形式;从文化交流的性质上看,又是中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代表;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留学生毫无疑问地应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桥梁和中介;从其结果来看,不仅形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潮,而且由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的大量引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形态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不同留学生群体与中外文化交流

根据出国的时间和地域,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可以分为三个,即留美幼童群体、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群体和清末民初留学日本学生群体。

(一)容闳及留美幼童与中美早期的文化交流

容闳回国以后,为实现在美的远大理想,经过许多周折,由李善兰推荐,认识了曾国藩,又因曾派其赴美国采购机器成功而被曾赏识,被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到江苏任职,从而得以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主

主要内容为派遣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的“条款四则”,最终在 1871年由曾国藩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也正是由于曾、李这两位权倾一时之重臣的联名上奏,派送幼童留美计划很快得到批准,并决定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并从 1872年夏天开始派出了包括詹天佑在内的首批幼童 30名。其后,于 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各派出 30名,共 120名,“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2](P161)。

清廷原定幼童留美时间为 15年,后因顽固派的破坏,从 1881年始分三批全部撤回,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学业。他们回来之初,也没有得到重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容闳的创举、努力和幼童们此后的实践,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容闳和幼童们带回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民主观念),对于开拓中西文化的交流渠道,传播西学,改变中国人对西学的偏见,削弱封建思想的影响,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这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其一,在引进和从事电报、铁路等方面的技术工作中成绩卓著,幼童们除因故撤回和在美国病故以及未回的 26人,其后都被清政府录用。经过四年的实践,“迭经月课、季课”,并由李鸿章“屡次亲临考校,试以所习各艺,均能融会贯通,各有心得”[2](P162),粗有成效。因此,李鸿章奏请光绪帝从优给奖。留美幼童创造的杰出成就有: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开创了我国独自修建铁路的记录,后任民初的北京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周万鹏主持了宁汉线、桂滇线等电报线路的规划和建设;唐国安先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后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这批学生还有 16人列名外交界,其中梁敦彦曾任外交部尚书,唐绍仪任外交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梁诚任驻美公使等。在当时极为封闭的历史条件下,也正是由于这些人使清廷和广大的国民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由所谓“奇技淫巧”之偏见逐步上升为利国利民的科学,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化的进程。其二,这批留美学生养成了运用西方文化中民主思想、法律观念等社会政治学说的习惯,冲击了清廷上层建筑中的封建意识特别是皇权观念。例如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清廷派出与南方军民谈判的首席代表唐绍仪及其随从蔡廷幹等,均是留美幼童出身,唐虽是袁世凯之密友,但由于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影响,在谈判中却不断地向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出电报,强调全国民众主张改变国体,清帝退位乃大势所趋;而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又恰恰是自费留英出身的伍廷芳,也主张清政府寿终正寝。因此,他们一起向袁世凯发起要清帝退位的电报攻势,并被采纳。当然,清帝退位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像唐绍仪等深受美国民主政治观念影响的新型政治家,与封建的皇权观念针锋相对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封建观念的顽固,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学说和法治观念,在当时未能居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冲击了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和人治的陋习,并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向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迈进。

第二,容闳及留美幼童们在美国的言行,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和传播了中华文明,为以后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幼童们抵达美国后,即被分到美国老师家中,美国母亲们见到这些来自异邦的孩子,拉过来又抱又亲;在以后多年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职责,美国的有关部门、人士也十分热情友好。“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人人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3](P74-84)幼童们进入学校后,与美国同学一起学习专业知识,一起打棒球,玩足球,毫不逊色于美国同学。对于中国幼童在美国的学习,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知名人士在听说中国将撤回幼童的消息之后,在致清总督衙门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即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失。而美国

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欢洽之地位。”[1](P142-143)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正是容闳及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容闳倡议并促成幼童留学,冲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教育的格局,掀开了中国留学教育之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大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留美幼童虽然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完成学业,但是容闳开启的留学教育并未停止,其后即有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学习;甲午战争以后,又有数以万计的学生涌向日本,其后更是不可阻遏。因此,自容闳开始至清末民初,直至今日,浪浪相推的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这可以通过几个事例来说明: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可以说无不是留学出身,如严复、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晏阳初、张伯苓、陶行知、郭秉文、吴贻芳等;又如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人士1103人,其中留学生为904人,占总数的82%;他们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的教育思想,谋划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例如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后正式颁行的第一个新学制癸卯学制,就深受日本学制的影响,而五四后的“六三三四学制”则取法于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原因就是留学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参与的结果;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教育活动如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也无不与留学生有关。

(二)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留美幼童派出后,清廷鉴于“洋务”人才的缺乏,几经研究,决定向“泰西”各国派遣留学生,总共分为4批;1877年、1886年、1897年,人员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总共有80余人,分布国家主要为英法,学习内容主要为船政、枪炮、机械制造等,都与当时的海军业务与新建的工业有关,最后一批因经费困难,未按预定时间学习6年,仅3年即回国。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是中国最早派出的赴欧留学的人员。由于他们出国前岁数较留美幼童大,受到一定的专业训练和外语训练,因此,在专业学习方面取得了较扎实的现代科学知识,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亦有所了解,回国后,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也较为广泛。

第一,引进了西方的造船、采矿、海军业务等科学技术,缩短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差距。如陈兆翱、魏瀚等自行设计了我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开济号”,打破了在福建船政局工作的欧洲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造船技术的断言。学船舵驾驶的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既可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4]。后来,他们与叶祖圭、林永升、邱宝仁、黄建勋、萨镇冰等都成为北洋海军主要军舰的管带(舰长),成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第一批关键人物。

第二,通过担任专门学校的教职,传播西方文化,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如严复,1879年回国后,即担任福建船政学堂的教习,后又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培养了驾驶与管轮专业学生200多人。其他担任教职较有建树的留欧学生有黄庭、王回澜等,他们以中国人的身份首次担任了福建船政学堂的外文教师。王凤喈、林振铎也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任教,培养了很多现代专门人才。

第三,大力介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其他学术理论,开启民智,影响了清末民初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推翻帝制、促进民主共和贡献卓著。其代表性人物是严复,他幼习旧学,后考入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1877年由洋务派送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在留学期间,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英国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去居民区观察基层社会组织,参观工厂,去法庭旁听,并与驻英公使郭嵩焘讨论国家富强之道和中西学术的异同,还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名著,接受进化论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进化论的信奉者。1879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著作,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成为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严复的译著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某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更重要的是,他结合这些介绍、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所有译著中,《天演论》影响最大。因此,他是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

(三)晚清留日学生群与中外文化交流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纷纷到日本“寻医求药”,掀起了晚清留日的高潮。在中国留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日学生人数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人数之多是相当惊人的。从1896年官派留日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应当在22000人以上。[5](P4)对此,费正清是这样概括的:“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6](P393)与以往留学欧美者大多学习自然科学和海军业务不同,这批人中有感到中国有被瓜分之虞而学习社会科学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从政法、文史、外语、师范教育、音乐、美术到体育都有,其中以师范、政法和陆军业务为热门。这批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创办报刊杂志,传播西方文化。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始于1900年11月创刊的《开谈录》和12月创刊的《译书汇编》。前者的创办人为郑贯一等,后者的创办人为杨廷栋、杨荫杭等。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云南》等。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物外,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仅与法学有关的刊物即达60种以上。[7]大量传播西方文化的刊物即有《译书汇编》、《游学译编》(1902年11月创刊)等,它们“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先后据日文转译了法国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民约论》,英国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迈尔的《自助论》等著作。

第二,通过大量译介日文、西文书籍和编著,介绍欧洲和日本的现代科学文化。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的译介大潮,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人数之多,能量之大,影响之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1900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他们通过出版《译书汇编》月刊,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的著作及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大量著作。杨度、黄兴和陈独秀等也曾翻译出版或编著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从内容看,20世纪初留日学生比较集中地译介日本学者论述日本情况的著作,最初多与明治维新的内容有关。据中国学者陈应年在《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一文介绍,清末译介有关维新问题的中文著作约20本,像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论著,都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视。留日学生还通过日文译介西方的科学文化论(逻辑学)著作,法学著作尤受到重视,欧洲和日本的法学著作至少有70种被译为中文。现代音乐、美术等艺术也有很多门类是通过沈心工、李叔同、高剑父等留学生传入中国的。还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这种译介传播范围广泛,大量的日本词汇传入中国,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有的一直使用到现在,如“自由”、“民主”、“人格”、“人权”、“政府”、“政策”、“选举”等,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

第三,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新式教育,促进了晚清中国教育体制的革新,进一步促进了西学东渐。晚清推行新政,1903年清政府为解决各级师范学堂的师资,要求各地派人到日本学习师范。自此以后,学习师范者与日俱增。他们回国后,即被派往各地的初级师范担任监督、教师,如鲁迅回国后,即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07年,清政府还规定,其他学科的官费生回国后,也要担任专门教员5年。因此,大批留日学生回国,缓和了师资紧缺的矛盾,推动了晚清新式教育的发展。其中最可一说者,乃是留日学生参与制订了晚清新式的教育学制。在军事教育方面,留日学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军校的重要师资,对推动中国军事教育的现代化有重要影响,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曾任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蔡锷、吴禄贞等都曾担任一些军事学堂的教职。

第四,大批留日学生或参加清政府的新政,如参加清建的“修律”等,或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曾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8](P465)留学生不仅用社会改良,而且用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封建帝制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民初政坛的反反复复,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封建的专制制度思想文化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讲推翻清王朝,扫荡各地的封建军阀,就从上层建筑打倒

了阻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政治堡垒,因而,留日学生和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五,大量激进的回国留学生,是清末民初文化思想领域一支最重要的队伍,成为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考析《新青年》主要作者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除胡适为留美出身外,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高一函、沈兼士等都是留日学生。因此,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中酝酿、产生和发展的。明确这一点,不仅可以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和肯定留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可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深对出国留学工作的认识,重视对留学生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综上所述,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发生了变化:“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仅改变了以往东西方若即若离、时断时续的文化交流的走向,而且改变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形态,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由此揭开了新篇章,并促使近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加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在近代以来这一复杂、艰难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学生们积极弄潮,为传播西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东西奔走,上下求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业绩。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容闳.西学东渐记·大学时代[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 [2] 李鸿章.奏请从优给奖美国回华学生折[A].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C].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3] 温秉忠.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A].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 [4]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A].庸庵全集[C].光绪年间刻本.
- [5] 周棉.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M].徐州:中国矿大出版社,1997.
- [6]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7] 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J].法学研究,1997,(1).
- [8]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turned Students and the Litera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ZHOU Mian

(Xu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exchange between modern times'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egan in the Opium War. The colony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were the products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y of the literatur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children studied in USA, the students of Fujang shipping school studied in Europe and the students studied in Japan during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ociety transform into modern formation by introducing advanced knowled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y made specific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modern China; the colony of returned students; literatur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